## 不應存在的存在:《四庫全書》的錢謙益身影考論

楊晉龍\*

#### 一、前言

民主社會的本質是尊重選擇,尊重每個人有意識與有意志的不違法與不危害他人權益的自由選擇權,包括政治認同的選擇權在內,這當然是二十世紀以後方才傳入中國的嶄新觀點。就政治認同選擇的理由而論,可以是個人權益的維護,可以是家族利益的維護,可以是民族權益的維護,可以是意識形態的維護,可以是單一政權的維護,更可以是群眾權益的維護。就傳統中華帝國而論,春秋時期的子路(前542—480)和子貢(前520—456)曾質疑管仲(前725—645)不能效死公子糾(?—前685)的「不仁」,孔子(前551—479)對此則頗不以為然。「孔子「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必「被髮左衽」等的理由,自然是一種排除個人而重視民族與群眾權益的政治認同觀,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孔子這種以民族、群眾權益為優先的政治認同觀,不僅歷久彌新,而且依然值得世人重視遵循。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辦之「『2017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7年4月27日)。渥蒙與會學者及三位不具名審查學者的糾謬與提供睿見,使得本文訛誤因而降至最低,內容更加可信,謹此申謝。

<sup>\*</sup> 楊晉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sup>《</sup>論語·憲問》:「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論語集註》卷七,頁十三上至十三下。本文研究之標的乃《四庫全書》,是以除非《四庫全書》未著錄或有訛誤,否則徵引之文獻皆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3.0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以下不再注明。再者,《十三經》之經文常見,故版本資訊下文亦不再注出。

孔子的政治認同觀,子路和子貢是否全盤接受?不得而知。但觀察傳統中華帝國,尤其宋代以後,面對類似管仲這種政治認同事件,例如政權更迭之際,針對那些選擇效忠新政權者,除了進入民國時期以外,<sup>2</sup>整個傳統中華帝國,對這類效命前朝者,總會給予寬厚的讚揚;至於效忠新政權者,即使是維護群眾權益而效命新朝,卻不免要受到後世的質疑,甚至嚴苛的譴責。從而可知後世顯然並未接受孔子「民到于今受其賜」這類重視民眾權益的觀點,而是循著子路和子貢「匹夫匹婦」的政治認同觀思考反應。是以身處承平時期的歐陽修(1007–1072),可以理直氣壯的詬罵身處風雨飄搖時期的馮道(881–954)為「無廉恥者」,<sup>3</sup>始終在精神上忠於朱明皇朝的顧炎武(1613–1682)也從而附和之。<sup>4</sup>可能是歷史上統治者當中,最勤於讀書與作詩的清高宗乾隆帝(1711–1799),<sup>5</sup>同樣也有「長樂取堪憎」的政治表態。<sup>6</sup>可見子路和子貢這類政權認同優於群眾權益的思想觀點,在號稱以儒家思想為本的傳統中國,相對於孔子群眾權益優於政權認同的觀點,<sup>7</sup>影響顯然更為深固。

明清政權更迭之交,在明朝即擁有大名,甚至有資格進入內閣機要之選,雖受 崇禎帝(1611-1644)故入其罪的無辜罷斥,<sup>8</sup>卻受福王朱由崧(1607-1646)的禮遇,乃

<sup>&</sup>lt;sup>2</sup> 民國成立以後,反過來讚美認同效命中華民國者,譴責或揶揄繼續效命清朝政權的「清遺 民」。關於「清遺民」可參考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一書的精彩討論。

<sup>&</sup>lt;sup>3</sup> 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五四〈雜傳序〉,頁一下。

<sup>4</sup> 顧炎武:《日知錄》,卷七〈古者不為臣不見〉,頁二八上至二八下。

<sup>5</sup> 乾隆帝:《御製文集三集》卷五〈釋奠禮成廣各直省入學額論〉曰:「自惟沖齡肄學,服膺聖教,迄今八袠開五,猶日孜孜,誨學無倦。」(頁九下)王杰等:〈御製詩集五集跋〉云:「考古詩人年高而詩多者,在唐為白居易,在宋為陸游。居易自寫詩文,蔵之名勝,以太和開成編年分四集,為卷僅二百有二,為什僅千有五十六。游之詩,初編祇四十卷,再編通前祇八十五卷,不第一家著作,未臻大觀也。宋紹熙輯《唐人絕句》,旁搜力索,闌入前後代,第及萬首。本朝輯《全唐詩》,一代三百年,二千二百餘人之作,纔得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而已。恭讀御製詩,成集者五,擺卷者四百三十四,僂篇者四萬二千七百七十八,而《樂善堂全集》更在前焉。」見乾隆帝:《御製詩集五集》,跋頁三上至三下。由此可見乾隆帝之勤於讀書與作詩。

<sup>&</sup>lt;sup>6</sup> 乾隆帝:《御製詩初集》,卷三五〈恭謁泰陵禮畢奉皇太后便道詣五臺瞻禮曼殊易州道中得 詩二十八韻〉,頁十九下。

<sup>&</sup>lt;sup>7</sup> 儒家這類群眾權益優於政權認同的觀點,當然還可以包括諸如:《周易·革·彖》「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尚書·仲虺之誥》説商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孟子·梁惠王下》所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離婁上》的「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以及《荀子·正論》的「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等等的記載。

<sup>8</sup> 此事相關記載甚多,較為詳細者可參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二四〈內閣二·會推二變〉,頁十三下至二五下。

〔下轉頁94〕

在多鐸(1614-1649)進兵南京之際,竟與百官會同「迎降」,<sup>9</sup>且接受新政權官職的「貳臣」錢謙益(1582-1664),在前述子路和子貢等政治認同性普遍觀點的關照下,無論其「迎降」的理由安在,自也理所當然要受到當代與後人的嚴厲詬責。再加上明代末季諸臣爭奪權力及文學主張有別的對立氛圍影響下,這類詬責不免也要帶入黨爭和文學立場的印記與情緒,因此初期針對錢謙益「迎降」詬責最嚴厲者,主要自然是那類與錢謙益本就有黨派利益或詩文觀點糾葛的個人或群體。<sup>10</sup>不過在傳媒極度不發達的傳統中國,由於訊息傳播非常不容易,私人詬責的影響雖也不小,但畢竟有其時空上的限度,是以真正使詬責錢謙益「迎降」事件得以普及於全國,不得不歸功於那位自詡為「十全老人」的乾隆帝。理由是任何事件一旦進入朝廷皇帝「聖諭」的發言系統,情況必然完全改觀,因為「聖諭」的傳播佈滿整個帝國,再加上《邸報》的助勢,訊息很容易就全面而普及地傳開。乾隆帝深惡痛絕且不間斷的詬責,<sup>11</sup>以及在子路和

<sup>9</sup>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軍至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州爵、保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寧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囿、項城伯常應俊、大興伯鄒順益、寧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寧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中伯黃周鼎、成安伯柯祚永、駙馬齊贊元、大學士王鐸;翰林程正揆、張居;禮部尚書錢謙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雲構、李綽;給事中林有本、陸朗、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敬及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一員、副將五十五員、迎降。」乾隆帝敕撰:《欽定八旗通志》,卷一二六〈和碩德豫通親王多鐸傳〉,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sup>10</sup> 後世詬責錢謙益及其相關意見的訊息,請參閱楊晉龍:〈錢謙益史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碩士論文,1989年),第二編〈錢謙益的歷史研究〉,頁37-189的分析討論。

根據《清實錄》的紀錄,乾隆帝最先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因沈德潛編輯《國朝詩 別裁集》求序,始注意到這位「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人品尚何足論|的錢謙 益;在八年後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因為「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 背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於是下令盡數銷燬錢謙益的著作。接著在同年八 月、十二月、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十年(1776)十一月、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 十二月、四十三年(1778)二月、四十四年(1779)正月、十一月、四十六年(1781)十月、 五十年(1785)七月、五十二年(1787)六月等多次的「聖論 | 內,或批判或提及錢謙益,到 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更基於「人臣策名委質,忠於所事。既遇宗社改移,自應抗節捐 軀,方無愧在三之義|的原則,以為「錢謙益之流,既經臣事本朝,復敢肆行誹謗,其居 心行事,尤不可問一,因而下令將錢謙益自《貳臣傳乙編》撤出。乾隆帝所謂「在三之義一, 原出《國語·晉語一》:「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 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 力,人之道也。|(卷七,頁一下)蓋指「受恩當回報|之基本義。然觀「報賜以力|之文, 則可知乾隆帝「自應抗節捐軀 | 之論,實已過度要求了。從《實錄》頻繁出現諸如「不足齒 於人類」(卷八三六,頁155;卷八三七,頁179;卷一三三二,頁1032)、「其人實不足齒」 (卷一千二十一,頁684)與「不足比於人類」(卷一千二十二,頁694)等語的詬責,可見乾 隆帝對錢謙益深惡痛絕的實況。上述引文見慶桂等(編):《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六四八,

子貢等普遍性觀點的助威下,使得錢謙益這位在政治上沒多大實質作用,對明朝滅亡與清朝建立沒多大實際功能的「文人」與「閒臣」,竟然成為清代以來,爭議最大且最受矚目的「貳臣」。<sup>12</sup>

錢謙益相關問題的現代式學術研究與探討,自十九世紀後期的清末以來,即已受到有心人的注意。民國以來除了涉及錢謙益文學、經學、史學、佛學等等表現與成就的討論外,關於錢謙益「迎降」、「反清」與「人格」的討論,同樣也一直沒有停歇,深入而有特見的成果所在多有。<sup>13</sup>本文因此不再加入此一範圍的探討,轉而考察相關研究學者未曾注意,但實際上卻大有助於「四庫學」及「錢謙益研究」更深入瞭解的議題,即乾隆帝全面禁燬錢謙益著作,甚至〈貳臣傳〉也要削去其名,處心積慮要讓錢謙益成為一位雖存在卻不能且不應存在的「過去」。乾隆帝此一利用政治權勢以

#### 〔上接頁93〕

頁251;卷八三六,頁155;卷八三七,頁179-80;卷八四一,頁239-40;卷八四八,頁356、358;卷九二六,頁457;卷九九六,頁317-18;卷一千二十一,頁683-85;卷一千二十二,頁693、693-94;卷一千五十一,頁50-51;卷一千七十五,頁434-35;卷一千九十五,頁689;卷一一四二,頁293-94、308-9;卷一二三五,頁596-97;卷一二八二,頁183-85;卷一三三二,頁1031-32等處。以上《清實錄》之資訊,係搜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1984-2016年)所得。

- 12 陳登原説:「自古文人之得謗者,無如虞山錢謙益牧齋。」見陳伯因(陳登原):〈錢謙益初學有學兩集書後〉,《正義》第3、4期(1946年1月),頁14。筆者主觀上當然不認同這類「投降」者,然根據筆者客觀的研究,後人對錢謙益「迎降」與「人格」上的詬責,缺乏一種較為「全面性」與「平民性」角度的考慮,大致上都依循「當權者」的「倫理立場」發言,此種當權者立場的倫理性譴責,當然有乾隆帝的影響力在其中運作的因素,筆者因此認為後人批評錢謙益「迎降」與「人格」的論點,「多不出『以乾隆之眼為眼,以乾隆之口為口』」。比較詳細的説明,請參閱楊晉龍:〈錢謙益史學研究〉,頁1-23。
- 問舉數例明之,如《申報》第220期(1873年1月11日),第2版就刊有龍湫舊隱:〈書錢牧齋外集後〉,論其人格;《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2卷第2號(1931年),頁269-91刊登朱東潤:〈述錢牧齋之文學批評〉,討論錢謙益的文學理論;《北大學生周刊》第2卷第1期(1931年11月),頁29-33刊登許采章:〈愛國詩人錢謙益〉,討論錢謙益的人格問題;日本吉川幸次郎:〈銭謙益と清朝経学〉,《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9號(1965年),頁1-83,論其經學;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頁317-70,論其佛學理念;《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頁140-46刊登吳海蘭〈錢謙益經學思想的形成與演變探究〉,論其經學表現;《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頁24-29刊登羅劍波、昂俞暄的〈錢謙益詩學批評中的義山詩〉,論其詩學表現;《領導文萃》2016年第16期(2016年8月),頁70-73刊登魯竹的〈明清貳臣錢謙益的兩難人生〉,論其人格;劉琴琴:〈構建網絡與尋求認同:錢謙益的交遊與史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則論其史學與人格等等,可見討論一直沒有停歇。相關論著目錄,嚴志雄、鄧怡菁(編):〈錢謙益文學研究要目〉,《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4卷第2期(2004年6月),頁121-33所錄,當可供參考。

消滅既有歷史的居心,在依照其自身意志而下令編輯的《四庫全書》內,<sup>14</sup>是否確實獲得執行?同時還要在此提問的前提下,繼續探問與此提問相關的錢謙益政治與文學等學術地位與成就,是否影響乾降帝禁燬意志有效執行的情況?

就二十世紀以來的學術形勢觀之,乾隆帝禁絕錢謙益正面形象與文學成就的意願,顯然並未能完全成功,否則就不會有種種涉及錢謙益學術成就與人格探討的研究成果出現,但考察這些研究成果時,卻可以發現關於乾隆帝的禁絕意圖在《四庫全書》是否有效實踐問題,一直未曾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這可能是因為考察此類問題,實與當今比較受到重視的錢謙益學術表現或學術影響等主流的研究議題典範,並無直接相關;然而,若從更大範圍的研究視野觀之,此問題卻與錢謙益研究史密切相關,亦即與錢謙益在清代學術影響力與學術地位的升降相關,同時也與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的當權者「倫理意圖」是否獲得有效實現相關。就全面理解「四庫學」與「錢謙益研究」的角度而言,此類議題自有值得注意探究的學術價值,此即設計本文進行研究的基本學術理由。

本研究設計是要通過瞭解乾隆帝全面禁燬錢謙益著作,以及透過整體的、全面性的官方批判,以求徹底消滅錢謙益歷史地位、抹殺錢謙益人格的強烈意志,在《四庫全書》著錄書籍中執行的情況,進而探討錢謙益在面臨皇權全面封殺的風暴中,能夠繼續存留學界的學術緣由。本研究主要乃立基於實證性探索的立場,藉助數位化網路資料庫,進行全面搜尋,以便獲得研究需要的相關資訊。筆者先前完成的〈《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説相關問題考述〉一文,<sup>15</sup>著重探討那類已被館臣修改而無法辨識的錢謙益相關資料,亦即探討那類沒有提供任何足夠辨識該文或論著源自於錢謙益等訊息的文獻資料;<sup>16</sup>本文是賡續之作,將研究的內容設定在具有實

<sup>&</sup>lt;sup>14</sup> 乾隆帝依照自身意志編輯《四庫全書》,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收錄文獻的記載,自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初五日頒發的「諭旨」,可以見到不斷出現諸如「候朕裁定」(頁55、58、461、559)、「候朕親加鑒定」(頁130、390)、「候朕鑒定」(頁393、1007、1882)、「朕親披閱釐定」(頁518)、「候朕簡定」(頁518)、「候朕定奪」(頁554)、「候朕親閱鑒定」(頁593)、「候朕親加釐定」(頁720)、「候朕閱定」(頁1090、1217、1676、1678、1941)、「候朕親定」(頁1419)、「候朕親裁」(頁1429)、「候朕欽定」(頁1750、2156)、「皆朕親加折衷」(頁1882)等等「自我確認」的表白,因而獲得有效證實。

<sup>15</sup> 楊晉龍:〈《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説相關問題考述〉,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第七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998年),頁31-48。另外與筆者此文相同研究內容者,還有林慶彰:〈四庫館臣篡改《經義考》之研究〉,載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239-62一文。

<sup>&</sup>quot;這類案例除《經義考》外,他如王琦〈李太白集注跋〉所謂「錢非純作《杜詩箋註》」(王琦:《李太白集注》,跋頁六下);或吳景旭《歷代詩話》「楊升菴《列朝詩集》」(卷七二,頁十三上)等。這類去除錢謙益姓名僅標書名,或者刻意更改錢謙益姓名的案例,在《四庫全書》 [下轉頁96]

際辨識錢謙益「名諱」與「著作」的資訊,<sup>17</sup>此即本文標題所以作「錢謙益身影」之故,指的當然就是出現在《四庫全書》內的錢謙益名諱與著作,或足以辨識為錢謙益之人或文的記載。《四庫全書》中不見其人名與書名的「錢謙益陰影」,不在本文探討之列。使用的基本文獻係以費時最久,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首部貯存於文淵閣的《四庫全書》。<sup>18</sup> 採取此部的理由,除因該部叢書已數位化方便使用外,最主要還考慮到此部叢書編纂耗時最久,也是成書最早,並成為後來各本《全書》的參照底本,這相對於爾後方陸續抄寫完成的「北三閣」與「南三閣」等六部《四庫全書》,無論就編輯者的年齡、編輯時的心態、技術性的操作與相關連的重要性上觀之,除了負責編輯者年齡較輕,精力相對較為旺盛外,在受命編輯工作的心理上,當該會抱持比較慎重認真的嚴謹態度為之,這就是本文選擇此部做為考察探討基本文獻的主要原因。<sup>19</sup>研究進行的程序,首先是「前言」,繼而將實際考察《四庫全書》著錄書籍出現或徵引錢謙益相關資訊的表現,之後分析推闡出現與徵引狀況的內涵與意義,最後分析探討所得結果,在學術研究中的意義與價值。目的是希望能對「四庫學」與「錢謙益研究」的學者,提供實證性的有效成果,因而有助於更進一步瞭解或深化相關研究的學術功能。

#### 〔上接頁95〕

出現的完整實況,由於著錄書籍多達三千多部,是以無法一一比對。審查學者熱誠提供杭世駿〈明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傳〉,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將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奉虞山錢宗伯」改作「奉向有詩名者」之案例。此見杭世駿:《道古堂集》,清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緒十四年(1888)汪曾唯修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卷二九〈明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傳〉,總頁230。筆者未見乾隆五十七年刻本。惜《道古堂集》非《四庫全書》著錄之書,無法列入討論,然也要特別感謝審查學者提供文獻訊息的熱忱。

- 17 本文依據錢謙益的名、字、號及著作,設定具有實際辨識錢謙益資訊的有效辭彙為:謙益、受之、牧齋、錢虞山、虞山錢氏、錢宗伯、蒙叟、常熟錢氏、牧翁、錢太史、虞山宗伯、錢居士、常熟大宗伯、初學、有學、列朝詩、杜詩箋、注杜、實錄辨證、群雄事略、義勇武安、絳雲、紅豆山等二十三個。這二十三個關鍵詞,同時也是設定搜尋的關鍵詞。
- 整隆帝:《御製詩集五集》卷十二〈題文源閣〉下自注云:「《四庫全書》自癸巳〔三十八年, 1773〕春開館,至辛丑歲〔四十六年,1781〕第一分書成,貯文淵閣。後館臣等請勒限三 年,趕辦全竣。隨於壬寅年〔四十七年,1782〕第二分書成,送盛京文溯閣;癸卯年 〔四十八年,1783〕第三分書成,弆此御園之文源閣;至第四分書應送熱河文津閣者,亦 於昨甲辰歲〔四十九年,1784〕內辦理完竣。」(頁九上)

## 二、錢謙益身影存在《四庫全書》實況考徵

乾隆帝下令編輯《四庫全書》之際,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與〈凡例〉提供的訊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發布搜訪遺書之詔時,就已經訂定相當周密翔實的收書原則:

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閒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攷覈典章,菊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勦説卮言可比,均應槩行查明。<sup>20</sup>

然而,若仔細觀察乾隆帝其後陸續頒布的相關「聖諭」,可知並非如此單純,過程中實際上有許多變化,並非從頭至尾一成不變。<sup>21</sup>大致來說,基本的禁燬作者與收書原則未變,但在細節部分則有某些改變。<sup>22</sup>整體來看,就是大原則不變,內容細節則因著乾隆帝的閱讀與反應而有所改變。

錢謙益著作的禁燬令,在編纂《四庫全書》之前即已頒布,見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丙辰日的「諭旨」。<sup>23</sup>這個全面禁燬錢謙益著作的原則,固然從未改變,但對於其他著作徵引錢謙益詩文的細節處理,甚至對錢謙益事蹟的處理方式,則在下令編纂《四庫全書》後,有些不同的變化。起先在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子日曾有「其經史及諸集內,所有錢謙益序文,語無悖謬者,俱不必徹燬」,以及《續藏經》

<sup>&</sup>lt;sup>20</sup>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首〈聖諭〉,頁1。參見同卷〈凡例〉,頁16-19。

<sup>&</sup>lt;sup>21</sup> 例如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下令捨棄「青詞一體」;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下令撤 出與〈美人八詠〉類似的「詞意媒狎,有乖雅正」之詩等等,都是屬於收書原則上細節的調 整。見《四庫全書總日》,卷首〈聖論〉,頁2-3、7。

<sup>22</sup> 例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下令: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王允成、葉向高等之著作,「惟當改易違碍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等等,由此可見乾隆帝對於「禁燬」原則不斷修改的狀況。文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頁3-4。

<sup>23 《</sup>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八三六,頁155-56。

內,有錢謙益塔銘跋二種,因其「所言皆釋家之事,語意俱無關礙,亦不必徹去」的「諭旨」;但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甲申日則有「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眾」的「諭旨」;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甲辰日又有「今各省郡邑志書,往往於名勝古蹟,編入伊等〔錢謙益、屈大均、金堡〕詩文。而人物、藝文門內,並載其生平事實及所著書目,自應逐加芟削,以杜謬妄」的「諭旨」;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戊申日更因「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書,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説,未經刪削」,下令懲罰紀昀(1724—1805)等編纂官員,並要求負責官員用心更正重抄。24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三日紀昀等官員,將處理後的結果回報乾隆帝,其中數條與錢謙益著作的禁燬直接相關:

《國史考異》,係考訂明太祖、成祖兩朝國史之是非,其中引錢謙益之説甚多,而不著其名,且詞相連屬,難以刪削,應行撤燬。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多列已燬之書,應行一律刪削。

姚之駰《元明事類考》、仇兆鰲《杜詩詳註》,俱襲引錢謙益撰著,而去其名, 應一律刪削。

朱鶴齡《愚庵小集》,紀昀所指〈書元好問集後〉一篇,意在痛詆錢謙益,持論 未為失當。誠如聖諭,若於推許錢謙益者既經飭禁,而於詆訾錢謙益者復事 苛求,未為允協。惟朱鶴齡未與錢謙益絕交之先,往來詩文,有贈某先生詩 等作,又〈箋注李義山詩注序〉內紅豆莊主人皆係指錢謙益,應一律刪削。<sup>25</sup>

從以上不同時期的發言內容,大致可以瞭解乾隆帝與編撰官員,處理《四庫全書》著錄書籍內涉及錢謙益者的細部訊息。

再者乾隆帝雖曾在乾隆四十三年 (1778) 五月因楊維楨 (1296-1370)「非刺故國,頌美新朝」的表現,而有相較之下錢謙益「所毀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之心」的恕詞,<sup>26</sup>但到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六月庚申日卻下令「所有《貳臣傳》甲、乙編內,如馮銓、龔鼎孳、薛所蘊、錢謙益等者,著該館總裁詳細查明,概行奏聞徹去,不必立傳」。<sup>27</sup>錢謙益等從乾隆四十一年 (1777) 十二月庚子日被編入《貳臣傳》,接著在四十三年二月乙卯日被排入《貳臣傳乙編》,<sup>28</sup>到五十四年六月「不必立傳」的更動變化,

<sup>&</sup>lt;sup>24</sup> 同上注,卷八四八,頁356、358;卷一千二十一,頁685;卷一千九十五,頁689;卷一二 八二,頁183-85。

<sup>&</sup>lt;sup>25</sup>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2065-66。

<sup>&</sup>lt;sup>26</sup> 乾隆帝:《御製文二集》,卷十八〈題楊維楨鐵崖樂府〉,頁五下至六上;又見楊維楨:《鐵 崖古樂府》,卷前,頁一上。

<sup>&</sup>lt;sup>27</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三二,頁1032。

<sup>&</sup>lt;sup>28</sup> 同上注,卷一千二十二,頁693-94;卷一千五十,頁50-51。

可見乾隆帝的主張確實與時俱進,甚至越來越嚴苛。<sup>29</sup>根據前述「諭旨」等命令傳達的訊息,可以清楚看出乾隆帝懲罰錢謙益這位「不足齒於人類」的「貳臣」,最終決議是:錢謙益本人編著的作品必須消除淨盡,徵引或呈顯錢謙益正面事蹟的著作及詩文等不得存留於世。正因如此,纔會有軍機大臣阿桂(1717–1797)上奏責怪「原辦之提調、總校、分校等並不詳加校訂,總纂官又不將書內偏駁字句及徵引錢謙益之話刪除淨盡,以至訛謬叢生,脱遺卷頁,疎漏之咎,均屬難辭」的追責之事。<sup>30</sup>

本文即以乾隆帝用帝皇之政治力要讓錢謙益的所著「詩文」、「生平事實」、「所著書目」等均「應逐加芟削」不留片言,且不得存留「推許錢謙益者」;以只准存留「詆訾錢謙益者」的編輯原則為準,考察《四庫全書》著錄書籍中,錢謙益相關訊息出現的實況,以下即分成「人名」與「著作」兩大項進行探討。

#### (一)錢謙益「人名 |存在的事實

《四庫全書》著錄的書籍,依據前述文獻呈現的實際要求而論,可知乾隆帝與負責官員對於「推許錢謙益」的言論,要嚴加禁制;至於「詆訾錢謙益」的言論,則可以因為實際需要而不予刪削,存留而讓錢謙益這位「居心行事尤不可問」者的姓名流傳於後,主要是用來突顯錢謙益「行同狗彘」的「醜穢」行為。<sup>31</sup>終極目的則是要讓錢謙益無法「倖免將來之訾議」,以及「不能逃斧鉞之誅」,以便可以有效彰顯乾隆帝「扶植綱常,折衷公當至意」,用「以勵臣節而示來茲」。<sup>32</sup> 這就是《四庫全書》得以出現錢謙益之名的緣故。根據設定相關條件搜尋的結果,錢謙益出現在《四庫全書》的實際狀況,如下表所示。

<sup>&</sup>lt;sup>29</sup> 審查學者認為本文「未分清清廷不同時期對錢謙益的看法是不同的」,此處的相關討論, 應該可以回應質疑。

<sup>&</sup>lt;sup>30</sup>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2194。

<sup>31</sup> 沈季友編《檇李詩繫》錄沈進〈過拂水山莊〉詩下館臣按語云:「此為錢謙益之妾栁是,帷箔不修而作,故存而不削,以癉其惡。」(卷二八,頁五四下)館臣以為該詩係因栁是「帷箔不修而作」,是以「存而不削」,此種心態實在非常可議。蓋館臣見沈進此類以追風捕影之言毀人名節之「髒詩」,不僅不加刪削,反見獵心喜而藉以為口實,不僅有違乾隆帝「崇尚醇雅」之收詩基本宗旨,同時也在汙辱編輯者自身的人格,非但不能「癉」錢謙益之「惡」,反顯館臣卑鄙下流之思想,殊不可取。《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曾有一論曰:「夫房幃祕地,男女幽期,曖昧難明,嫌疑易起,一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即使果真,何關外人之事?乃快一時之口,為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鬼神之忌矣!況蛇盃弓影,恍惚無憑,而點綴鋪張,宛如目睹,使人忍之不可,辯之不能,往往致抑鬱難言,含冤畢命,其怨毒之氣,尤歷劫難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恐刀山劍樹之上,不能不為是人設一坐也。」此可為館臣的無恥作風進一解。見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77年),卷十〈如是我聞四〉,頁177。相關討論可參閱楊晉龍:〈錢謙益史學研究〉,頁101-2,注41-42。

<sup>32 《</sup>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三二,頁1032。

## 《四庫全書》內出現錢謙益諸名諱表

御製詩三集四集 (14)	乾隆帝	錢謙益: 46/2, 46/2-3, 50/4, 50/12, 87/6, 94/3 (以上〈三集〉); 48/5, 52/16, 52/18, 59/9, 59/9-10, 77/15, 100/22, 100/24 (以上〈四集〉)
明史 (13)	張廷玉等	錢謙益:70/16, 253/9, 254/2, 285/1-2, 295/12, 305/35, 308/28, 308/31, 308/37, 308/39, 308/42, 308/46, 308/49-50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10)	傅恒等	錢謙益: 114/8-10, 114/10, 114/28, 115/5-6, 115/33, 116/18, 116/29, 116/53, 116/64, 116/78-79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10)	張廷玉等	錢謙益:34/9-10, 34/10, 34/11, 37/9, 38/29, 40/1, 40/13, 40/38, 40/55, 40/69
明史紀事本末(8)	谷應泰	錢謙益:66/29-30, 66/30-31, 66/36, 66/41, 71/15- 16, 71/23-25, 72/27, 74/11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8)	余敏中等	錢謙益:2/3, 2/7, 2/10, 3/41, 5/21, 5/22, 5/45, 7/34
明詩綜 (7)	朱彛尊編	錢受之: 70/7, 70/11-12 牧齋: 22/8, 28/26 虞山錢氏: 41/6 蒙叟: 32/27-28 常熟錢氏: 30/8
御製文初集二集(6)	乾隆帝	錢謙益:12/10(以上〈初集〉);7/6-7,7/9,8/1-2,8/3,18/5-6(以上〈二集〉)
御選唐宋詩醇(5)	乾隆帝敕撰	錢謙益:13/5, 13/33, 17/7, 17/18, 18/30
經義考(5)	朱彝尊	錢謙益:62/5, 71/27, 87/11, 87/15–16, 88/2
東林列傳(4)	陳鼎	錢謙益:10/16, 17/20, 24/8-9, 24/17
欽定石渠寶笈(4)	張照等	錢謙益: 16/8 錢牧齋: 16/34 牧翁: 38/13 錢虞山: 31/16
盛京通志(4)	阿桂等	錢謙益:14/13, 14/15, 17/25, 17/27
江西通志(2)	謝旻等	錢謙益:70/1, 103/17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2)	張玉書等	錢受之: 450/3 牧翁: 33/13
明儒學案 (2)	黄宗羲	錢牧齋: 25/7, 45/17
放翁逸稟 (2)	陸游	牧齋:上/14,下/10

書名(次數)	編著者	稱呼與出處(卷/頁)
明文海(2)	黄宗羲編	錢宗伯: 452/14
		錢太史: 269/24
學餘堂詩集(2)	施閏章	錢宗伯:11/12
		虞山宗伯:21/1-2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1)	孫岳頒等	錢謙益:47/4
春明夢餘錄(1)	孫承澤	錢謙益:24/13-20
愚菴小集(1)	朱鶴齡	錢謙益:提要 /3
水經注集釋訂訛(1)	沈炳巽	錢謙益:34/4
望溪集(1)	方苞	錢謙益:5/20
學古緒言(1)	婁堅	錢謙益:提要 /1
鐵崖古樂府(1)	楊維楨	錢謙益:乾隆帝題跋 /1
輟耕錄(1)	陶宗儀	錢謙益:乾隆帝題跋 /1
山西通志(1)	覺羅石麟等	錢謙益: 125/39
東維子集(1)	楊維楨	錢謙益:乾隆帝題跋 /1
檇李詩繋(1)	沈季友編	錢謙益: 28/54
山東通志(1)	岳濬等	錢謙益:36/95
湖廣通志(1)	邁柱等	錢謙益:49/46-47
劉蕺山集(1)	劉宗周	錢謙益:7/3-4
欽定續通典(1)	嵇璜等	錢謙益: 19/10-11
元明事類鈔(1)	姚之駰	錢謙益:8/8
秘殿珠林(1)	梁詩正等	錢謙益: 14/4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1)	乾隆帝敕撰	錢謙益: 5/9
勝朝殉節諸臣錄(1)	余敏中等	錢謙益:乾隆帝諭旨/3
皇朝(文獻)通考(1)	乾隆帝敕撰	錢謙益:231/18
皇朝通志(1)	乾隆帝敕撰	錢謙益:54/7
欽定八旗通志(1)	乾隆帝敕撰	錢謙益:126/11-12
御定全唐詩(1)	曹寅等	錢謙益:227/23
榕村語錄(1)	李光地	錢受之:30/22
韓集點勘(1)	陳景雲	錢受之: 3/4
管城碩記(1)	徐文靖	錢牧齋: 25/5

書名(次數)	編著者	稱呼與出處(卷/頁)
潛邱箚記(1)	閻若璩	牧齋: 6/10
御定佩文韻府(1)	張玉書等	牧齋:51之3/44
杜詩詳註(1)	仇兆鰲	牧齋: 6/69
四川通志(1)	黄廷桂等	常熟大宗伯牧齋錢公:47/64
李太白集注(1)	王琦	錢牧齋:35/18-19
古歡堂集(1)	田雯	錢虞山:17/11
編珠(1)	高士奇輯	虞山錢氏:徐乾學序/3
御選明詩(1)	張豫章等	虞山錢太史:90/2
江村銷夏錄(1)	高士奇	虞山錢居士: 1/76
西陂類稿(1)	宋犖	蒙叟: 22/13
松泉集(1)	汪由敦	蒙叟:9/4
王右丞集箋注(1)	趙殿成	牧翁:附錄 /13
書法正傳(1)	馮武	錢宗伯:9/32
浙江通志(1)	嵇曾筠等	錢宗伯:196/28
震川集(1)	歸有光	錢宗伯: 13/11

錢謙益出現在《四庫全書》的字號與其他不同的別稱,總共151次。除錢謙益出現108 次外,其他出現的字號有十三種:牧齋7次、錢宗伯5次、錢牧齋5次、錢受之5 次、牧翁3次、蒙叟3次、錢虞山2次、虞山錢氏2次、常熟錢氏1次、牧齋錢公1 次、虞山宗伯1次、虞山錢太史1次、虞山錢居士1次等,總共出現在六十部書籍, 唯相關名諱僅出現一次者有四十一部書,出現二次者六部書。再考察其中如《愚蕃小 集》、《學古緒言》、《鐡崖古樂府》、《輟耕錄》、《東維子集》、《勝朝殉節諸臣錄》等六 部書,則或者在〈提要〉,或者為抄錄乾隆帝之言。雖然就《四庫全書》本的狀況而 言,附在各書之前的〈提要〉與乾隆帝的「諭旨」,都需要當成該書完整的一部份看 待,但就比較實際的角度來看,這並非原作者的發言。是以原作者發言提及錢謙益 名諱的書籍,實僅有五十四部,就文淵閣《四庫全書》總共3.457本的著錄數量而言, 不過1.56%而已。何況其中還有諸如《春明夢餘錄》、《東林列傳》、《明史紀事本 末》、《元明事類鈔》、《欽定續通典》、《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 編》、《明史》、《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欽定八旗通志》等記載明末歷史事件的書 籍,自然不能將參與當時重要歷史事件,例如崇禎元年(1628)在北京朝廷,因「枚 卜」 閣臣而引發的「閣訟案」,以及相關涉的「錢千秋賄考案」、「張漢儒訐案」,甚至 順治二年(1645)在南京朝廷的「迎降」事件,自然都無法將當事人錢謙益排除在外。 若不計這些歷史事件紀錄的書籍,則其他非因歷史事件而出現錢謙益名諱的書籍, 實際上僅四十四部,僅佔全部著錄書籍的1.27%而已。

錢謙益出現在《四庫全書》的頻率似乎不高,然而若用來與受到館臣尊崇的學者,如顧炎武出現在自身論著外的其他一百三十五本書,閻若璩出現在六十二本書,黃宗羲出現在四十二本書的實況對比,就這位一再出現在乾隆帝公布的「諭旨」中公開點名的首惡「貳臣」而言,無論是正面的接受或負面的批評,竟然還能出現在六十本書內,相對於前述諸人,在實質上的出現頻率,並不能算低。以上是考察《四庫全書》出現錢謙益名諱的結果,以下考察錢謙益論著文本出現在《四庫全書》的表現狀況。

#### (二)錢謙益「著作 |存在的事實

乾隆帝下令必須全燬的錢謙益著作,依據《高宗純皇帝實錄》、《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的「諭旨」與「奏摺」所示,姑且先不論其中是否存在同書異名的問題,至少包括《初學集》、《有學集》、《牧齋詩鈔》、《杜詩箋註》、《列朝詩集》、《牧齋尺牘》;<sup>33</sup>《牧齋性理抄珍》、《牧齋雜文》、《列朝詩集小傳》;<sup>34</sup>《錢謙益經序》、《錢謙益史序》;<sup>35</sup>《錢牧齋初學集詩註》;<sup>36</sup>《牧齋詩》;<sup>37</sup>《錢謙益序札》;<sup>38</sup>《十三經序文》;<sup>39</sup>《杜律箋註》;<sup>40</sup>《杜工部詩集》;<sup>41</sup>《唐詩合撰》;<sup>42</sup>《錢謙益四書文》;<sup>43</sup>《楞嚴蒙鈔》等,<sup>44</sup>總共有二十種列名其中。<sup>45</sup>

<sup>33 《</sup>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2296。

<sup>34</sup> 同上注,頁653。

<sup>35</sup> 同上注,頁1097。

<sup>&</sup>lt;sup>36</sup> 同上注,頁800。

<sup>&</sup>lt;sup>37</sup> 同上注,頁1212。

<sup>38</sup> 同上注,頁1282。

<sup>39</sup> 同上注,頁1305。

<sup>&</sup>lt;sup>40</sup> 同上注,頁1364。

<sup>&</sup>lt;sup>41</sup> 同上注,頁1366。

<sup>42</sup> 同上注,頁1367。

<sup>43</sup> 同上注,頁1370。

<sup>44 《</sup>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九二六,頁457。

<sup>45</sup> 出現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收錄的奏摺等必需全燬的錢謙益二十種著作,其中諸如《初學集》、《有學集》、《杜詩箋註》、《列朝詩集》、《列朝詩集小傳》、《牧齋尺牘》、《牧齋雜文》、《錢牧齋初學集詩註》、《杜工部詩集》、《牧齋詩鈔》、《牧齋雜文》等十一種,至今依然流傳於世。《楞嚴蒙鈔》當是《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之簡稱,此書後來收錄在乾隆三年(1738)完成的《大藏經》內,並未徹燬。乾隆禁燬錢謙益著作之書目,亦可參考《(道光)蘇州府志》:「錢曾有《注初學集詩》二十卷、《注有學集詩》十四卷。又錢謙益有《開國羣雄事畧》十五卷、《開國功臣事畧》若干卷、《明太祖實錄辨誣》五卷、《讀杜詩寄盧小箋》五卷、《杜詩箋》二十卷、《列朝詩集》八十一卷、《北盟會編鈔》三卷、《重編義勇武安王集》二卷、《楞嚴金剛心經蒙鈔》十四卷、《內典文藏》四十冊、《絳雲樓書目》六卷、《初學集》一百卷、《有學集》五十卷。……乾隆中並奉例禁,今概不著錄。」見宋如林等(修)、石韞玉(纂):《(道光)蘇州府志》,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收入《愛如生數據庫・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2013年),卷一二五〈藝文四〉,頁十三下。

考乾隆帝雖存心根除錢謙益著作及所有文本,以至於不留片言的地步,但基於「彰善癉惡,信今傳後」,以「垂教於萬世」的更高目標,因而容許那類因「詆訾錢謙益」的需要,不得不徵引或述及錢謙益其人或其著作者,出現錢謙益的名諱與著作,最明顯的就是附載於各書之前的「提要」與乾隆帝的「論旨」,這也就是《四庫全書》必然會出現錢謙益事蹟與著作之故。然則《四庫全書》著錄書籍實際徵引錢謙益著作的狀況如何呢?根據搜尋所得,大致可以將《四庫全書》出現錢謙益論著的表現,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徵引或抄錄錢謙益論著或文本者;第二類是僅出現錢謙益著作的書名。以下製成表格説明。

#### 徵引或抄錄錢謙益論著文本者

浙江通志 (112)	嵇曾筠等	列朝詩集傳: 158/18, 158/35, 176/14, 178/12, 178/15, 178/16, 178/17, 178/17, 179/5, 179/10, 179/11, 179/13, 179/15, 179/32, 179/32, 179/33, 179/34, 179/34, 179/35, 179/35, 179/36, 179/37, 179/38, 180/10, 180/11, 180/11, 180/14, 180/14, 180/15, 180/16, 180/32, 180/32, 180/32, 180/34, 180/34, 181/8, 181/9, 181/11, 181/13, 181/13, 182/8, 182/19, 182/26, 182/29, 185/12, 185/13, 192/6, 192/28, 193/20, 194/10, 194/26, 195/13, 195/22, 196/36, 198/28, 198/29, 198/29, 199/11, 199/12, 199/23, 200/16 209/5, 235/14, 246/6, 246/20, 246/24, 247/1, 248/49, 248/49, 248/49, 249/1, 249/1, 249/5, 249/6, 249/23, 249/30, 249/39, 250/11, 250/20, 250/31, 250/31, 251/4, 251/6, 251/18, 251/18, 251/19, 251/19, 251/28, 251/29, 251/29, 251/29, 251/37, 251/37
		252/20, 252/21, 252/29, 252/30, 252/30, 254/15, 254/19 列朝詩集小傳:166/10, 280/43 列朝詩選:238/17
御定淵鑑類函(58) 王士禎等	列朝詩集: 100/17, 100/25, 100/27, 100/42, 100/42, 330/33 列朝詩傳: 258/9, 258/9, 258/9, 261/41, 261/41, 261/41, 261/42, 261/42, 261/42 列朝詩小傳: 257/22, 327/16, 327/16, 327/17, 327/17, 327/17, 327/19, 327/39 列朝詩集小傳: 324/13, 324/13, 324/23, 325/39, 325/44-45, 325/50 列朝詩集本傳: 324/35, 325/8, 325/37-38, 325/38, 325/38, 325/38, 325/38, 325/38, 325/38, 325/39, 325/41, 325/44 325/50, 325/52, 325/54, 326/5, 329/13, 329/13, 330/18, 330/18,	
		330/18, 330/18, 330/20, 330/23, 331/2, 340/44 杜詩箋注:56/36

書名(筆)	編著者	徵引或抄錄的著作與出處(卷/頁)
江西通志 (24)	謝旻等	錢謙益贈〈詩〉云: 103/17 列朝詩傳: 67/68, 68/3, 70/41, 70/51, 70/51, 72/22, 78/44 列朝詩集小傳: 86/37, 89/4, 89/12, 91/21, 91/21, 92/40 列朝詩小傳: 162/34, 162/34, 162/43, 162/49, 162/49, 162/52, 162/53, 162/53, 162/54, 162/54
陜西通志 (22)	劉於義等	列朝詩集: 54/82, 60/103, 63/92, 63/94, 63/95, 63/96, 63/96, 63/100, 63/100, 66/66, 66/110, 75/102, 75/103, 98/68, 98/70, 98/70, 98/91, 99/31, 99/33 初學集: 53/86 杜詩錢注: 16/104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 (21)	孫岳頒等	列朝詩集: 21/21, 38/20, 38/27, 38/30, 39/3, 39/4, 39/7, 39/10, 39/10, 39/10, 39/20, 39/20, 39/20, 39/33, 40/55, 41/27, 54/35, 54/39 杜詩箋注: 26/42, 27/47 錢謙益《箋注》云: 47/4
元詩選初集二集 (12)	顧嗣立編	列朝詩集:26/46, 34/3, 57/2, 58/4, 58/33, 61/1-2, 61/55, 61/64, 61/72, 62/1, 62/20, 67/33 列朝詩集小傳:《二集》19/64
湖廣通志 (11)	邁柱等	明列朝詩傳: 50/47, 55/17, 55/23, 56/26, 56/29, 56/29, 75/14 明列朝詩集: 57/57, 58/26, 58/29 杜詩箋註: 73/46
六藝之一錄(8)	倪濤	列朝詩紀:361/21 列朝詩集:362/11, 369/13, 370/2, 370/3, 371/9, 372/31 杜詩箋註:327/25
經義考 (7)	朱彝尊	錢謙益曰:62/5,71/67,87/11,87/15-16,88/2 錢謙益〈序〉曰:63/1-2 錢蒙叟《列朝詩集》:160/2
分隸偶存(5)	萬經	明人列朝詩集:卷下 /61 列朝詩集:卷下 /70,卷下 /72,卷下 /72,卷下 /73
山西通志(5)	覺羅石麟等	列朝詩集: 138/55, 147/21 列朝詩選: 230/91 列朝詩序: 230/98, 230/110
資治通鑑後編(5)	徐乾學	太祖實錄辯證: 175/22 實錄辯證: 177/13-14, 177/18 國初羣雄事略: 176/3 錢氏《羣雄事畧》曰: 181/3

書名(筆)	編著者	徵引或抄錄的著作與出處(卷/頁)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4)	余敏中等	錢謙益〈跋〉: 2/5-6, 2/6, 2/6-7, 2/33-34
御定駢字類編(4)	允祿等	列朝詩小序:39/15, 85/17, 200/34 列朝詩小傳:185/22
秘殿珠林(3)	梁詩正等	錢謙益〈書大悲心陀羅尼經秘本後〉: 4/4-7 錢謙益〈尺牘〉: 16/1-2, 16/2
欽定石渠寶笈(3)	張照等	列朝詩: 5/42 列朝詩選小傳: 16/34-35 錢虞山〈跋〉云: 30/1
御定佩文韻府(3)	張玉書等	列朝詩小傳:1之4/24 列朝詩小序:7之3/24 列朝詩集:23之1/35
御選唐宋詩醇(2)	乾隆帝御選	錢謙益曰:17/7, 18/30
御定全唐詩(1)	曹寅等	錢謙益曰: 227/23
管城碩記(1)	徐文靖	錢牧齋謂: 25/5
水經注集釋訂訛(1)	沈炳巽	箋杜詩云:34/4
五代詩話(1)	鄭方坤	有學集: 1/43
潛邱箚記(1)	閻若璩	列朝詩集: 6/104
欽定國子監志(1)	梁國治等	列朝詩集: 58/51
千頃堂書目(1)	黄虞稷	列朝詩云: 17/3
南宋院畫錄(1)	萬鶚	列朝詩集: 8/23
御定韻府拾遺(1)	王掞等	列朝詩小傳: 12/21
山海經廣注(1)	吳任臣	列朝詩集: 2/33
古懽堂集(1)	田雯	杜詩箋注:20/3

詳細考察《四庫全書》著錄諸書,確定其中二十九部書確實有徵引錢謙益著作與其他 文本為說,總共有319筆資料,除書畫序跋與尺牘之外,出現在各家書籍的錢謙益著 作,依照出現的名稱,則有二十一種稱法:列朝詩集傳109筆、列朝詩集74筆、列 朝詩集本傳27筆、列朝詩小傳21筆、列朝詩傳17筆、列朝詩集小傳15筆、明列朝 詩傳7筆、杜詩箋注4筆、列朝詩小序4筆、明列朝詩集3筆、列朝詩選3筆、列朝詩 2筆、列朝詩序2筆、實錄辯證2筆、太祖實錄辯證1筆、列朝詩紀1筆、箋杜詩1 筆、箋注1筆、列朝詩選小傳1筆、有學集1筆、初學集1筆、明人列朝詩集1筆、國 初羣雄事略1筆、羣雄事略1筆等。排除簡稱、個人特稱或抄錄之際造成的訛誤,統 整二十九部書徵引標明或可識別為錢謙益著作者,當為七部書300筆的徵引:《列朝 詩集小傳》201筆、《列朝詩集》86筆、《杜詩箋注》6筆、《太祖實錄辯證》3筆、《國初 羣雄事略》2筆、《初學集》1筆、《有學集》1筆等,此即《四庫全書》著錄書籍徵引錢 謙益著作與其他文本的狀況。

除徵引著作內容為說者之外,《四庫全書》的目錄類著作,地理類書籍的「藝文志」,當中也有部分書籍著錄錢謙益的著作,不過這些書籍著錄之際,大致都僅有書名而無作者名,顯然是刻意刪去錢謙益的名字。負責編纂抄錄的官員,顯然也知道遵守乾隆帝發布的禁燬訊息,這也就是第二類僅出現錢謙益著作書名的狀況,相關實情如下表所示。

#### 僅出現錢謙益著作書名者

書名	編著者	著作名稱與出處(卷/頁)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余敏中等	初學集: 2/6
明史	張廷玉等	開國羣雄事略、太祖實錄辨證:97/5 <sup>46</sup>
欽定石渠寶笈	張照等	列朝詩選小傳: 16/35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	孫岳頒等	杜詩箋注:〈纂輯書藉〉/35 初學集:〈纂輯書藉〉/52 有學集:〈纂輯書藉〉/52 列朝詩集:〈纂輯書藉〉/53
江南通志	趙宏恩等	明列朝詩: 192/69 杜詩箋註: 192/69
明詩綜	朱彝尊編	錢謙益《列朝詩集》:〈提要〉/2
千頃堂書目	黄虞稷	開國羣雄事略: 5/34
學餘堂詩集	施閏章	錢宗伯〈塔光詩〉: 11/12

這些出現在各家著作的錢謙益諸書,實與前一表格「徵引為說」的書籍相同,不過《國初羣雄事略》或作《開國羣雄事略》而已,但比較特殊的是《明詩綜》出自館臣批判的需要,《千頃堂書目》為私人著作,而其他五部書籍都出自朝廷或地方官員編輯。朝廷官員與「天高皇帝遠」的外放官員有別,朝官是皇帝近臣,必然是最早接收皇帝諭旨的群體,照理説應該最能認真執行皇帝的意旨,但既然接受乾隆帝刪除錢謙益著作的諭旨,卻又為何僅刪除其姓名而留存其著作?目的何在?不免令人好奇。

錢謙益身影出現在《四庫全書》的狀況,包括各種不同的名諱與著作,透過較為 詳密的搜尋考察,獲得的成果,如上述所考:名諱出現在六十部書中,著作出現在三

<sup>&</sup>lt;sup>46</sup> 兩書連在「戴重《和陽開天記》一卷」之後,刪去錢謙益姓名,可能因而誤導讀者,以為是 戴重的著作。

十三部書內,扣除重複,總共有八十四部書存留錢謙益的訊息,佔《四庫全書》著錄書籍總數的2.43%。至於《四庫全書》編纂者讓錢謙益存留的理由,是否確實是「因為」或「徹底」要貫徹乾隆朝君臣推許錢謙益者禁制、詆訾錢謙益者存留的編輯原則而存在?則是下一節準備探討的內容。

## 三、錢謙益身影存在《四庫全書》狀況的推闡

乾隆帝根據在位掌權者的倫理思路,有感於錢謙益「在前明時,身躋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既投順本朝,仕躋卿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狂悖詆毀之詞,刻入《初學》、《有學》二集」。「托名勝國,妄肆狂狺」。欲「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生」、「失節之羞」,「反側僉邪」,「進退無據」,「大節有虧」。「居心行事,尤不可問」,「實不足齒於人類」的行為表現,基於「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的理由,<sup>47</sup>下令禁燬錢謙益所有著作,並要求將他書引述其文本者全數剷除。<sup>48</sup>原本立意要讓錢謙益的事蹟與著作完全消失在《四庫全書》著錄的書籍內,<sup>49</sup>後來為了「植綱常,示彰癉」的需要,讓詆訾錢謙益的

<sup>&</sup>lt;sup>47</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八三六,頁 155;卷八三七,頁 179;卷一千二十一,頁 684;卷九 九六,頁 317;卷一千二十二,頁 694;卷一千三十二,頁 1032等處。

<sup>&</sup>lt;sup>48</sup> 審查學者認為本文「對欽定書與非欽定書未加區分」,且認為「皇帝若專門不下達重審欽定書的聖旨,是沒人敢動的」。又說本文「對錢謙益的個人著作與匯編的書未加區分」,並認為「對這兩類書,館臣是注意區分的,這應當是得到乾隆帝的默許」。由於筆者認定乾隆帝「概行燬棄」的禁燬諭旨,針對的是錢謙益具名的所有著作,筆者以為當然包括「個人著作與匯編」,以及「欽定書與非欽定書」,是以確實未曾注意區分。再者審查學者又有「引用而不注出處,會引起讀者懷疑,全注則會使錢謙益揚名,不得已便只注書名,略去作者」的高見,此一推測自也有可能。不過著錄書中確實出現諸如:「錢氏《列朝詩集》」、「錢虞山《箋注》」、「常熟大宗伯牧齋錢公」、「有學集」等之類,是以此論還可以再斟酌。至於「欽定書」可保留錢謙益著作,以及「匯編的書」可以徵引,「得到乾隆帝的默許」等之類,實非筆者所能知,亦無相關文獻資料可以有效支持,是以筆者僅能敬聽。感謝審查學者提供的睿見。

<sup>49</sup> 此處所以限定在《四庫全書》發言,蓋乾隆帝或者確實有意讓錢謙益著作完全在世間消失,但他並沒有徹查那類連《四庫全書總目》「存目」都不收的書籍,是否存留錢謙益著作文本,是以本文纔會限定在《四庫全書》的範圍內發言。當然若真要徹底斬絕錢謙益著作,則檢查當時所有出版品雖有可能,但就實際的操作技術而言,即使花費龐大物力與人力,也無法保證效果一定很好。從乾隆帝可控制的《四庫全書》,依然出現不少錢謙益文本的事實,可知全面禁燬像錢謙益這樣在文學、史學等方面表現特出者的著作,並不容易。事實上乾隆帝自己也很清楚,所以才會在「聖諭」中出現諸如:「若士民等,因此查辦,反以其書為寶,不行舉出,百計收藏者,則其人自取罪戾」與「但恐因有查禁之旨,書賈等轉視為奇貨,乘間私行刷印密藏,希圖射利,尤不可不早杜其源」等帶有嚴重「憂患意識」的警告式強調。見《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八三六,頁155;卷八三七,頁179。

訊息,繼續存留在《四庫全書》,這也就是館臣在王士禎(1634-1711)《居易錄》裡寫下「此乃斥謙益妄憑臆見,好為詆諆之非,故存之」的「按語」之故。<sup>50</sup>考察《四庫全書》,確實可以發現某些「詆訾」錢謙益的訊息,實際狀況如下表所示。

#### 負面評論錢謙益的資料

明詩綜 (9)	朱彝尊編	「《列朝詩集》所載〈勸學詩〉一章,未必出于御製也。」(1/20)「《列朝詩集》作周憲王,亦非也。」(2/1)「去疾,《列朝詩集》不載其官閥。」(13/17)「璠樹名林,本係一人,《列朝詩集》複出,誤也。」(17/5)「牧齋據二徐氏,辯景哲非山人,其實不然。」(22/8)「錢氏《列朝詩集》,搜羅鄉曲先進靡遺,獨不及文安,何哉?」(28/17)「牧齋尚書殆亦道聽之説。」(28/26) 「《列朝詩》稱其以母喪,毀瘠卒,葢攷之未詳云。」(37/20)「錢氏《列朝詩・神鬼門》載〈桃花仕女詩〉八絕,〈竹枝〉三首在焉。其二乃好事者為之,不足信也。」(43/15)
元詩選初集二集(5)	顧嗣立編	「《列朝詩集》載此詩至『棗栗亦傾筐』而止,不知此處如何可住?是必傳寫之訛,未經較定故耳。」(〈初集〉58/4) 「前人所選《列朝詩・甲集前編》,具載元末詩人,獨不及靜思〔郭鈺〕,豈當時未及見其全稿耶?」(〈初集〉59/46) 「選家于《列朝詩集》載之〈前編〉。選家好為曲説,至引謝皋羽、犁眉公為喻,抑何其不相類乎!」(〈初集〉61/1-2)「《列朝詩集》所載葉樵雲顒字伯愷,洪武中登進士,集中詩皆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初集〉62/1)「明太祖至戊申始建元洪武,時方舟歿已二年矣。舛為可笑。而《列朝詩集小傳》未經駮正,且云:宋景濂銘其墓曰『明詩人徐方舟』,復何所據乎?」(〈二集〉19/64)
居易錄(3)	王士禎	「『夜暗歸雲遶柁牙』一首,乃宋姜夔堯章詩,見《白石集》。 《列朝詩》 収之,作張如蘭詩,誤矣!」(20/23) 「杜詩〈少年行〉:『黄衫年少來宜數。』〔姚〕寬引〈霍小玉傳〉 『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云云,更為無稽,而箋注 《杜詩》者取之。」(23/17) 「予甞讀三峯藏禪師《語錄》及《五宗原》,亦天童之諍子 也。而錢氏《列朝詩》謂『餘分閏位,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 三峯之禪,旁午發作,並為孽於斯世』云云。師與錢氏皆常 熟人,而詆諆如此,豈別有謂耶?不可解也。」(27/19)

<sup>50</sup> 王士禎:《居易錄》,卷二七,頁十九下。

書名(筆數)	編著者	評論內容與出處(卷/頁)
池北偶談(2)	王士禎	「吾鄉公文介公(鼒),詩文淹雅,絕句尤工。不減 唐人風致。而《列朝詩》取之甚少,不可解。蓋南人多抑西北 也。」(11/1-2) 「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乃撰《列朝詩選》者,力分左右 祖,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 自,誤後學不淺。」(14/26)
愚菴小集 (2)	朱鶴齡	「《列朝詩集》亦云然。用行乃宦裔也。子威少隨母長之 説,恐屬無稽。」(14/11) 「《列朝詩集》云:振一夕死于虎。『釣鰲客』,振 自號也。余考子昌為吾邑汾湖人,未聞死于虎。所云『飼虎 人』者,悲其困處深山,只堪飼虎耳,非實事也。不然『釣鰲 客』,亦豈真有鰲可釣乎!」(14/11)
潛邱箚記(2)	閻若璩	「嘗聞前輩撰《列朝詩集》,先採詩於白下,從亡友黃俞邵及 丁菡生輩借書。每借,輙荷數擔至。前輩以人之書也,不著 筆,又不用籤帖其上,但以指甲搯其欲選者,令小胥鈔。胥 奉命惟謹,於搯痕侵他幅者亦並鈔,後遂不復省視。」(5/37) 「博極如牧齋,亦不免誤。」(6/10) <sup>51</sup>
杜詩詳註(1)	仇兆鰲	「子美大節,在自拔賊中歸行在,不在救房琯也。錢氏直欲以此為杜一生氣節,欲推高杜,則極贊房;因極贊房,遂痛貶帝。此自門戶習氣。以此推之,牧齋而秉史筆, 三百年人物,枉抑必多。絳雲一炬,有自來矣!」(6/69)
李太白集注(1)	王琦	「錢牧齋譏其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遊』,為自相矛盾。然子美與太白同時,編舉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寶初蘇晉尚存,《舊書》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滋誤,亦未可知。」(35/18-19)
樵雲獨唱(1)	葉顋	「《列朝詩集》載:『葉樵雲洪武中登進士,』集中詩皆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列朝詩集》所載,未知何所據也。案〈太學題名碑〉,建文庚辰科有葉顒,亦金華人。庚辰為建文三年,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三年。《列朝詩集》當必因此而訛。」(〈提要〉/1-2)

<sup>51</sup> 此條與《欽定天祿琳琅書目》一條,均載有正反兩面之意見,是以將書內正面意見歸入「讚美」之列,負面意見則歸入「詆訾」之列。審查學者認為本文「評價只分負面與正面兩類,是不夠的,還有褒貶並存的」,所見甚是。唯本文在討論《四庫全書》著錄書籍評論錢謙益的言論,重點正是在刻意區分「詆訾」或「推許」的不同,混合「詆訾」與「推許」這類「褒貶並存」的評論,因此也就沒有另外再細分一類,而是重複分別納入「詆訾」與「推許」這兩類中討論。感謝審查學者的提問,使筆者能更明確的説明。

書名(筆數)	編著者	評論內容與出處(卷/頁)
榕村語錄(1)	李光地	「孫高陽詩不知變。魏孝子學漪〈百韻詩〉,便段段有變化。可見錢受之不知詩,選明詩,止選高陽,未為允也。」(30/22)
清江詩集(1)	貝瓊	「《列朝詩》誤作張司丞羽。」(5/8,附考)
韓集點勘(1)	陳景雲	「虞山錢受之在萬厯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記〉,以『慢』 字作『慢侮』解,誤甚!」(3/4)
明儒學案 (1)	黃宗羲	「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桞之間, 錢牧齋 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 不知定山, 其自謂知白沙, 亦未必 也。」(45/17)
三魚堂文集(1)	陸隴其	「余竊怪虞山錢氏輯《列朝詩集》,於先生之詩,登者寥寥無 幾。如今集中所載〈養馬行〉、〈昔有篇〉諸詩,其用意深遠, 與杜子美〈兵車行〉諸作相為表裏,而如吾核公所稱, 尤足鍼學者之膏肓。錢氏皆逸而不錄,亦所謂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者歟!」(9/34)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1)	傅恒等	「《舊史例議》引錢謙益《列朝詩集》, 謙益説不足據。」 (102/41)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1)	余敏中等	「謙益人品不足稱,而長於鑒古。」(2/7,館臣曰)

《四庫全書》批判錢謙益的資訊,排除〈提要〉涉及較為激烈的羅織式「先驗性」詮釋話語,<sup>52</sup>依據原作者本身的發言,考察所得大致有此十六部書的33筆資料。這些發言的內容,涉及錢謙益的人品作為、事實考證、詩文評價、學派立場等訛誤或是非判斷的學術針砭,自然也涉及到錢謙益學術能力高下的評判。

葉顯《樵雲獨唱》書前提要根據顧嗣立《元詩選》考辨葉顯生平,更進一步稽覈,證實顧嗣立考證之是,以見《列朝詩集小傳》所言之非,因此納入討論。至於《明詩綜》書前提要的「汙名化」激情話語;《愚菴小集》書前提要以為朱鶴齡「與錢謙益同郡,方謙益箋註杜詩時,嘗館於其家。乃集中無一語推重之,所作〈書元裕之集後〉一篇,稱『裕之舉金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及金亡不仕,隱居秀容,詩文無一語指斥者。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詢詈之理,非獨免咎,亦誼所當然。乃今之訕辭詆語,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者,非徒誖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蓋隱刺謙益而發,尤可謂能知大義者矣」(頁三下至四上)。這類館臣羅織式的發言,則不列入討論。再者,《四庫全書總目》中《愚菴小集》提要「其言蓋隱刺謙益而發」一句,作「其言蓋隱指謙益輩而發」(卷一七三,頁1524);乾隆帝敕撰:《皇朝文獻通考》,卷二三一〈經籍考二十一〉,則作「借裕之以責謙益」(頁十八下)。「隱指謙益輩」與「隱刺謙益」,「指」與「刺」,有無「輩」字,指涉的內涵範圍與評論情緒,大有不同,頗堪注意。但無論如何,這恐是紀的附會羅織式的詮釋,朱鶴齡未必有此意也。

發言評論錢謙益者,如陸隴其(1630-1692)、李光地(1642-1718)兩位道學家,批評錢謙益「不知詩」,實在沒有多大的説服力;黃宗羲(1610-1695)的懷疑自有道理,但也僅是詩學理論有別的道理;閻若璩(1636-1704)「傳聞」之言,只是博君一粲的「笑談」;余敏中(1714-1779)等的「人品不足稱」,只是浮泛之詞,這些實際上對錢謙益的殺傷力應該不會太大,但也算是符合「詆訾」的負面要求。

再如仇兆鰲(1638-1717)「牧齋而秉史筆,三百年人物,枉抑必多,絳雲一炬,有自來矣」的詬詈;顧嗣立(1669-1722)「好為曲説」的批評;王士禎「南人多抑西北」、「師與錢氏皆常熟人,而詆諆如此」、「誤後學不淺」等對其立場的質疑;以及朱鶴齡(1606-1683)「『釣鰲客』,亦豈真有鰲可釣乎」的反唇相譏。這幾位作者的評論,確實符合「詆訾」的基本要求,但就出現的數量來看,其實極其有限。或者館臣遵循「禁燬」的命令,較之「詆訾」的訴求為高,因此沒有刻意留存這一類資料。

《四庫全書》除了前述涉及「詆訾」的資料,也留存部分違反乾隆帝諭旨的「推許錢謙益者」之論。這些正面評價甚至讚美錢謙益的資料,至少有下表所列諸條:

#### 正面評價錢謙益的資料

居易錄(2)	王士禎	「顧嗣立 彙選元詩集, 其傳例倣虞山《明列朝詩》, 甚有雅裁。」(4/23) 「如〈戰城南〉、〈江南曲〉、〈祖龍行〉等作,《列朝詩》皆載之。」(13/17)
施注蘇詩(2)	邵長蘅	「倣須溪劉氏、虞山錢氏《註杜》例,離註於全詩之後, 閱之心目開明,覺蘇詩壁壘為之一變。商邱公欣然擊節 曰:『此舉足當玉局功臣,抑不愧吳興益友矣!』」(〈註 蘇例言〉/4) 「劉辰翁之評《杜集》也,同時倡和,例皆附錄。 錢虞山《箋注》,仍而不刪也,今視此例。」(〈註蘇 例言〉/8)
潛邱箚記(1)	閻若璩	「博極如牧齋,亦不免誤。」(6/10)
文端集(1)	張英	「《列朝詩選》載其事甚詳。」(15/4)
存研樓文集(1)	儲大文	「徐幼文〈賦許墓詩〉又選于《明列朝詩》,而載 于邑沈少司空家之《荊溪外紀》者也。」(12/30)
李太白集注(1)	王琦	「錢非純作《杜詩箋註》,亦附錄逸詩四十八篇,皆有偽作在其間。若先別之而使其無可混,正足以資後學之考核而甄別其裁矣,夫又何尤?」(〈跋〉/6)
歷代詩話(1)	吳景旭	「楊升菴《列朝詩集》云: 余以升菴此語, 不惟証黄 佐之悮, 而并証石倉可也。」(72/13)
資治通鑑後編(1)	徐乾學	「《實錄辯證》最詳且覈。」(177/13)

書名(筆數)	編著者	評論內容與出處(卷/頁)
欽定石渠寶笈(1)	張照等	「虞山錢牧齋在京見之,曰:牧翁之言,必有所本, 後載入《列朝詩選小傳》中。」(16/34-35)
御選唐宋詩醇(1)	乾隆帝御選	「錢謙益《箋》,十得八九,擇其合者錄之。餘人尚有雌 黃,抑亦不知量耳!」(17/18)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1)	余敏中等	「謙益人品不足稱,而長於鑒古。」(2/7,館臣曰)
欽定盤山志(1)	蔣溥等	「〔王士禎〕從《列朝詩集》中,錄得〈盤山石刻詩〉一首, 故相國孫文定公〈游記〉一首,絕句格詩六首,祈補入。」 (16/13)

《四庫全書》出現稱許錢謙益的資訊,大致有前述十二部書的14筆資料。其中「錢非純作《杜詩箋註》」和「楊升菴《列朝詩集》」改稱作者之名,雖可解釋為接受乾隆帝指令的結果,但同時也可以解釋為「迴避」或「違抗」乾隆帝指令的消極作為,因為這種改名僅能對不讀書者有效,尤其《列朝詩集》早已在《四庫全書的〈集部總敘〉與〈明詩綜提要〉中,明白告訴讀者乃是錢謙益的著作,更是難以欺瞞讀書人。這十二部書涉及的內容,至少包括學術博極、蒐羅極富、編輯體例佳、考證確實、箋杜可信、長於鑒古等等的讚美之詞。發出這些讚美訊息者,閻若璩說錢謙益「極博」;徐乾學讚美《太祖實錄辨證》「最詳且覈」,以這兩位發言者的地位,所說應該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但最特殊的則是這些讚美錢謙益的書籍中,竟有四本是朝廷編輯掛名「欽定」、「御選」的官書,余敏中等稱美錢謙益「長於鑒古」之外,掛名乾隆帝敕撰,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恭校上的《御選唐宋詩醇》,竟然留存「錢謙益《箋》〔《杜詩箋注》〕,十得八九,擇其合者錄之,餘人尚有雌黃,抑亦不知量耳」,如此高度讚美之文,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四庫全書》著錄書籍除了直接讚美錢謙益及其著作的資訊,實際上也用另一種形式肯定錢謙益的學術成就,那就是直接徵引或抄錄錢謙益論著與文本,如果不是充分肯定錢謙益著作或文本的學術價值,當不至於如此。總體考察前述錢謙益著作被徵引或提及,因而存留在《四庫全書》的實際表現,可以發現存留最少的是《初學集》和《有學集》,這自然是由於這兩部書乃是經常出現在乾隆帝「論旨」的錢謙益代表作,館臣與抄錄者分外熟悉,是以受到特別看待,這應該不會太過意外。但其中也同樣出現掛名「欽定」、「御選」或地方官員編纂的官書,肯定性徵引錢謙益論著與文本的實際表現,其中如朝廷官員編纂的《御定佩文齋書畫譜》,不僅將錢謙益的著作,不具名的置放在書前〈纂輯書藉〉的明顯位置,書中甚至出現具名徵引《列朝詩集》和《杜詩箋注》二書的21筆資料。既然在〈纂輯書藉〉刪去錢謙益的名字,顯然知道錢謙益這些書都是不得徵引的禁書,竟然還出現此實質違抗禁令的表現,甚至還存留有「錢謙益《箋注》云 | 之文,同樣不可思議。

更特殊的是《列朝詩集》一書,館臣曾在〈集部總敘〉與〈明詩綜提要〉的評論中,

將之「汗名化」為「顛倒賢姦,彝良泯絕」,「貽害人心風俗」;「以記醜言偽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顛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甚至幻想為「久已澌滅無遺」的著作,<sup>53</sup>但不僅王士禎稱讚該書體例「甚有雅裁」,《御定佩文齋書畫譜》還加以徵引。就《四庫全書》整體的留存狀況觀之,《列朝詩集》(含《列朝詩集小傳》)的書名出現在二十七部書中,其中二十部書有合共287筆的實質徵引,這更是絕對違逆乾降帝意志的表現。

總結前文搜尋所得二十九部書總共320筆的徵引資料,再結合此處十二部書14 筆資料,汰除重複,總共有三十六部書正面肯定錢謙益或其著作,佔《四庫全書》出 現錢謙益資訊總數八十四部書的42.86%,此則為直接發言批判十六部書的2.25倍, 顯然與乾隆帝原先只准存留「詆訾」錢謙益資訊的命令與期望不相符合。再者,肯定 錢謙益的書籍中,除《千頃堂書目》、《山海經廣注》、《五代詩話》、《元詩選初集二 集》、《六藝之一錄》、《分隸偶存》、《文端集》、《水經注集釋訂訛》、《古權堂集》、《存 研樓文集》、《李太白集注》、《居易錄》、《南宋院畫錄》、《施注蘇詩》、《經義考》、《資 治通鑑後編》、《管城碩記》、《潛邱箚記》、《歷代詩話》等十九部為私人著作外,其他 諸如《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秘殿珠林》、《陝西通志》、《御定全唐詩》、《御定佩 文齋書畫譜》、《御定佩文韻府》、《御定淵鑑類函》、《御定駢字類編》、《御定韻府拾 遺》、《御選唐宋詩醇》、《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欽定石渠寶笈》、《欽定國子監志》、 《欽定盤山志》、《湖廣通志》、《山西通志》等十七部,則為滿清朝廷或官署編輯的官 書,其中還包括《江西通志》、《山西通志》等十七部,則為滿清朝廷或官署編輯的官 書,其中還包括《江西通志》、《浙江通志》、《陝西通志》、《欽定盤山志》、《湖廣通 志》、《山西通志》等地方志書,可見乾隆帝在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下的兩道「諭旨」, 並沒有確實執行,否則就不可能出現此種狀況。

依據前述的證據與討論,無論是基於編纂者刻意的安排、歷史陳述的必要,還是抄錄者無意的疏忽,尤其是在十七部官書內大量出現抄錄或徵引錢謙益著作或文本的表現,可以很清楚的證實乾隆帝意欲禁絕錢謙益著作文本的期望與命令,固然產生甚大的影響,但並沒能在《四庫全書》內獲得徹底的遵循。出現這類有違乾隆帝禁絕意志的現象,到底是編輯官員無意的疏忽?還是別有用意的存留呢?或者是無法迴避而不得已的存留?以下試作分析推論。

《四庫》館臣編纂《四庫全書》無法完全遵照乾隆帝「禁絕」錢謙益訊息意旨執行的原因,編纂者的疏忽與不負責任,<sup>54</sup>當該是因素;但除此以外必然也有別的原因,尤其《四庫全書》存留的錢謙益相關訊息,並非虛構而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陳述或記載,

<sup>53 《</sup>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集部總敘〉,頁1267;卷一百九十〈明詩綜一百卷〉,頁 1730-31。

審查學者指正本文「未能具體指出館臣疏忽之例」,此就學術言甚為合理,但就實際操作言,筆者僅能從呈現的實況,推測此一可能性。這主要是從職業倫理的角度發言,就實際的文本表現而言,筆者確實無法明確指出何者為館臣等疏忽而導致,但這應該無礙於本文論點的成立。無論如何,感謝審查學者的意見。

因此不可能全都歸責於編纂官員。例如與明朝滅亡關係甚大的崇禎朝「閣訟案」,常 **敘述崇禎朝的歷史,以及因為此事而帶來的惡劣影響,無論利用何種曲筆書寫,都** 無決迴避錢謙益。再者,錢謙益在明朝之際的文學成就與地位,同樣也是無法完全 抹殺的歷史事實,是以《明史》的〈藝文志〉可以將錢謙益的著作或姓名刪除,但《明 史·文苑傳序》敘述明代文學發展時,卻無法避開錢謙益,因此《四庫》本的《明史》 也只能依循武英殿版「至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 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的敘述,55這是屬於明代的部分。明亡之後,錢謙益還編輯了 《列朝詩集》。此書各家詩人的小傳及評論,雖有其特定立場的瑕疵,卻是對整個明 代詩家與詩作,相對完整與較為深入的整理評騭,只要涉及明朝的詩人與詩作,很 難不參考《列朝詩集》,這也就是官方編纂的《浙江通志》徵引112筆、《御定淵鑑類函》 徵引57筆、《江西通志》徵引23筆、《陝西通志》徵引20筆、《御定佩文齋書書譜》徵 引 18 筆、《湖廣通志》徵引 10 筆等, 捨棄其他 [安全合法 | 作者的意見, 必須徵引不 安全不合法「受命禁燬」作者書籍為證的原因。至於箋註《杜詩》的成就,可從《御選 唐宋詩醇》「錢謙益《箋》,十得八九」的評論瞭解。對明初歷史考證的成就,可藉徐 乾學(1631-1694)「《實錄辯證》最詳且覈 | 的評論證實。錢謙益對書畫鑑賞的精當, 連館臣都不得不承認,因此纔會有錢謙益「長於鑒古」的評斷。56可知《四庫全書》無 法完全禁絕錢謙益在學術表現上的正面形象出現,主要還是受到錢謙益在明清兩代 政治及學術方面的重要地位影響之故,因而導致《四庫》館臣無法或不能遵循乾隆帝 的意願而行。當錢謙益在政治上與學術上,均有其必然存在的地位與成就之際,無 論館臣願意不願意,均無法完全不提或僅存留那類謾罵的資訊,除非館臣立意毫無 顧忌「以假為真」的竄改歷史,但這應該不會是乾隆帝或受命館臣編纂《四庫全書》樂 意出現的狀況。

根據前述諸文獻提供的學術訊息,可知錢謙益在文學創作與評論、史實考證及藝術鑑賞等方面的成就,使得館臣處身在這些無法迴避的歷史事實之前,很難甚至不可能「心安」的遵循乾隆帝「諭旨」,因而徹底消滅錢謙益的相關訊息,進而全面攻計錢謙益,這種站在歷史事件之前,自我要求真實呈現史實的基本心理,應該是導致《四庫全書》的編輯官員,無論是刻意或是疏忽,無法徹底執行乾隆帝毀滅錢謙益「人格」與「學術」意志的另一項內在原因。

<sup>55</sup>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序〉,頁二上。

<sup>56</sup> 審查學者以為本文「未能引證文獻具體分析無法迴避之例」。筆者以為此段所言,可以回 應質疑。

#### 四、結論

乾隆帝由於錢謙益「既經臣事本朝,復敢肆行誹謗」,因而詬責其書「悖理犯義」,毀 其人為「喪心無恥」,「行同狗彘之徒」,同時為了「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 漠不靈之魄 | , 下令禁燬其書 , 並盡可能詬詈謗譭其人。57 從乾隆帝 [論旨 | 內出現許 多情緒強烈的謾罵式言詞, 實在不宜出於九五之尊的皇帝之口, 即使二百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閱看之際都能輕易感覺到乾降帝對錢謙益的深惡痛絕,當時受 命編輯《四庫全書》的臣僚,應該更能感知到乾隆帝極力討伐錢謙益的強烈情緒。 那麼在「伴君如伴虎」皇權專制時代的《四庫》館臣,在受命編輯《四庫全書》之際, 照理應該要絕對遵循回應乾隆帝強烈毀滅錢謙益的恨意,因而將涉及錢謙益正面形 象的資訊排除在《四庫全書》之外,僅存留足以「詆訾|錢謙益的資訊。但經由前述實 證性的考察,可知《四庫》館臣並未能完全遵循乾隆帝的旨意,因為《四庫全書》內固 有某些「詆訾」錢謙益的訊息,但「推許」錢謙益的訊息甚至更多。然則《四庫》館臣何 以敢冒大不諱的違逆乾隆帝意旨,讓徵引或讚美錢謙益著作與文本的訊息存留在 《四庫全書》,並且還出現在地方官員編纂的「地方志書」內,甚至還存留在名義上屬 皇帝編纂的「欽定」、「御撰」、「御製」等朝廷官書內,這難道僅僅只是《四庫》館臣疏 忽不負責任的表現而已?或者還有其他可能存在的學術因素呢?前述這些方面的實 際狀況,經由網路資料庫的搜尋統整,並進行詳細的考證分析,最終獲得下述幾點 結果:

首先,傳統中國對政權認同改變者的評價,缺乏孔子「民到于今受其賜」的平民立場思考,大致都從「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掌權者倫理角度立論,因此「迎降」滿清的錢謙益,起初雖也受到敵對者的責罵,但同時也還有相同集團者或不同意見者的同情聲音。然而,由於同團者的消亡,以及乾隆帝對其人格的激烈詬責,從此以後同情之音消失,僅剩下仇口譴責之言,直至二十世紀以後方稍有轉折。是以就實際的歷史發展而言,乾隆帝詬責錢謙益涉及「迎降」的「怕死」人格問題,不僅存留在《四庫全書》,甚至其後的發展,確實趨向乾隆帝希望的方向進行,這雖不全是乾隆帝的影響,但確實與乾隆帝的大聲疾呼相關。

其次,乾隆帝因痛恨錢謙益投降又謾罵清朝的反覆無常,於是基於倫理教化功能的批判需要,下令禁燬錢謙益的著作,目的是毀滅錢謙益的人格與各方面的成就,因此同意《四庫全書》存留「詆訾」錢謙益的訊息;至於「推許」錢謙益的訊息,以及錢謙益的著作與文本,並不容許稍有存留。由於這個「詆訾」原則,《四庫全書》也就容許存留錢謙益之名。根據仔細搜尋的結果,錢謙益相關的名諱出現在六十部書中,錢謙益之名出現108次,其他十三種不同的名諱出現43次,總共出現151次。不過其中館臣書寫的〈提要〉之外,大多數是基於記載歷史事件需要的中性陳述,甚

<sup>57 《</sup>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三二,頁1032;卷八三六,頁155;卷九九六,頁317。

至有偏向同情錢謙益的口吻,例如崇禎元年「閣訟」及其後「張漢儒訐案」等的記載之類。這類存留雖未能符合乾隆帝「詆訾」錢謙益的存留原則,但館臣恐怕也不能擅自刪改,否則就會有竄改歷史之嫌,這應該不是館臣願意承擔的罪責。再者其中更有21次乃是徵引或抄錄錢謙益的著作或文本,這更是嚴重違背乾隆帝同意的「詆訾」存留意旨。可知乾隆帝消滅錢謙益歷史的意志,顯然無法在《四庫全書》內徹底執行,這雖也有可能是編輯館臣疏忽而造成,但其中更多則是基於歷史事件必須照實陳述的緣故。

其三,《四庫全書》中不僅出現錢謙益之名,同時也出現錢謙益的論著與其他文本,包括僅出現論著書名者。總共在二十九部書中,出現《列朝詩集小傳》、《列朝詩集》、《杜詩箋注》、《太祖實錄辯證》、《國初羣雄事略》、《初學集》、《有學集》等七部書的名稱,雖然其中多數僅有書名而沒有作者之名,但這實際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因為乾隆帝發布的禁燬書籍名單中,這些書自然會列名其上,即使沒有標明作者是錢謙益,讀者當然也知道這是錢謙益的著作。乾隆帝禁燬錢謙益著作的企圖,在此可謂徹底破滅。

其四,《四庫全書》內確實有符合乾隆帝「詆訾」錢謙益原則的言論,這類資料出現在十六部書中,總共有33筆。但也有「推許」錢謙益的資料,總共有14筆,出現在十二部書內。徵引或抄錄錢謙益論著與文本者,則是另一種「推許」的形式。總體而言,共有三十六部書334筆資料「推許」錢謙益,此為批判十六部書的2.25倍,出現的資料數量為批判者的10.12倍。這個結果顯然大大違背乾隆帝只准存留「詆訾」錢謙益資訊的命令與期望。

其五,《四庫全書》出現「祗訾」錢謙益的資料,不足為奇。但出現「中性」陳述,甚至「推許」錢謙益等,明顯違逆乾隆帝意旨的資料,其中或者有館臣疏忽刪改未盡的漏網之魚,但絕不可能完全是館臣疏忽所造成。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錢謙益在明朝政治上的行動與地位,館臣無法竄改歷史,只能據實留存;一是錢謙益在明清兩代文學創作與評論上的成就,個人對明初史實考證的翔實可信,以及在藝術鑑賞方面的功力,使得許多書籍徵引或選錄其評論、箋注之文。紀昀等就提到潘檉章(1626-1663)《國史考異》、姚之駰(1721進士)《元明事類考》、仇兆鰲《杜詩詳註》等,都有大量抄錄錢謙益論著的內容,若均刪削恐就難以成書,但又不能如《國史考異》般撤燬,因此只好掩耳盜鈴式的去除錢謙益之名,再利用簡稱、別稱或微調書名,以保留這些必要資料。這當是館臣既無法完全遵循乾隆帝的旨意,卻也無法違抗的矛盾衝突下,想出來的因應之道。反過來說,即使這些「推許」錢謙益的資料,都是館臣疏忽所導致,不也可以證明抄襲錢謙益論著的情況非常普遍,因而間接證明錢謙益學術影響力大?

其六,錢謙益影響的學術範圍,根據本文搜尋考得《四庫全書》出現錢謙益名諱或文本的八十四本書,以四部分類而論,「集部別集類」24本、「史部地理類」11本、「集部總集類 | 8本、「子部藝術類 | 7本、「子部雜家類 | 6本、「子部類書類 | 5本、「史

部傳記類」4本、「史部政書類」4本、「史部目錄類」4本、「史部編年類」3本、「集部詩文評類」2本、「子部小説家類」2本、「史部職官類」1本、「史部紀事本末類」1本、「史部正史類」1本、「子部儒家類」1本等,其中屬於子部者21本、史部者29本、集部者34本,沒有經部的書籍。從而可見錢謙益學術在明清兩代的影響範圍,主要是在集部,史部次之,子部又次之。其中尤其是「集部別集類」、「史部地理類」、「集部總集類」、「子部藝術類」、「子部雜家類」等的影響較大。

其七,本文探討受到乾隆帝激烈譴責詬罵的錢謙益,存留在《四庫全書》著錄書籍中的狀況,用以瞭解乾隆帝禁絕命令與存留原則落實的實際表現,進而分析乾隆帝禁絕與編纂原則無法確實獲得徹底執行,除館臣的疏忽之外,實與錢謙益在政治、文學、史學、鑑賞等方面的成就密切相關。研究所得成果,可以提供研究「四庫學」、「錢謙益研究」與「乾隆帝研究」等學者參考,因而有助於相關研究者,對錢謙益的學術影響,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禁燬存留原則,以及錢謙益存留在《四庫全書》的實際狀況與存留型態等更確實的瞭解。

2019/12/03修訂

# 不應存在的存在:《四庫全書》的錢謙益身影考論

(提要)

#### 楊晉龍

本文考察乾隆帝禁燬譴責錢謙益著作與人格之意旨,在《四庫全書》落實的狀況,並推測無法徹底落實的緣由。透過資料庫的搜尋,檢得八十四本書存留錢謙益的相關資訊,發現其中十六部書33筆帶有「詆訾」,卻有三十六部書334筆帶有「推許」的意涵。乾隆帝意旨無法貫徹的原因,館臣疏忽之外,主要當是錢謙益於政治上與學術上,均有其地位與影響,尤其在文學、史學、鑑賞等方面的成就,使得館臣無法完全抹煞,不得不予以保留。研究所得成果對錢謙益學術影響力,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禁燬原則的落實,《四庫全書》存留錢謙益實況與型態等的了解,有一定的助益。對相關研究者提供部分值得參考的資訊,或有助於四庫學、錢謙益研究、乾隆帝研究等方面議題的探討與發展。

關鍵詞: 錢謙益 乾隆帝 四庫學 四庫全書

# An Existence That Should Not Exist: The Presence of Qian Qianyi in the Siku quanshu

(Abstract)

#### Yang Chin-lung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survey is Qianlong Emperor's condemnation of Qian Qianyi's character and the prohibitory edict the Emperor issued to ban and burn Oian's writings. Was this edict carry out actually in the Siku quansh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n investigation seems necessary. The results of a detailed text search shows that 84 books within the Siku quanshu contain narratives related to Qian Qianyi. Among these narratives, there are only 33 instances of denunciation within 16 books, while 334 cases of commendation are found within 36 books—it is obvious that the Emperor's edict was not implemented. Besides the carelessness of editors, another possible factor for this non-implementation is Qian's achievement as a political figure, a man of letters, a historian, and a connoisseur, which might have imperceptibly restrained the editors from completely excluding Qian.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can facilitate further researches into Qian's academic influence among men of lett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Qianlong Emperor's principle of banned publications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the types of and circumstances behind the mentions of Qian within the Siku quanshu.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can offer points of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in the relevant field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tudies of Siku quanshu, Qian Qianyi,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

**Keywords:** Qian Qianyi Qianlong Emperor Siku studies Siku quanshu